

流通业发展、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

陈锦然¹, 王家荣², 杨雪萍³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2.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北京 100872;
3.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下,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推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 对于夯实国内大循环基础、深化内外双循环互促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流通业发展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 以及国内市场一体化所发挥的互补性作用。研究发现: (1) 流通业发展将显著推动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 并且这一积极作用主要通过流通业规模提升、结构优化、基础设施改善实现。(2) 门限回归结果表明, 只有当国内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时, 流通业发展促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积极作用才能显现。(3) 异质性检验结果提示, 在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与中西部地区中, 流通业发展对国家价值链分工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未来, 应进一步推动流通业的高质量发展, 逐步破除国内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 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 为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奠定基础。

关键词: 流通业发展; 国家价值链; 市场一体化; 统一大市场;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 F724; F7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54(2022)08-0015-14

DOI: 10.14134/j.cnki.cn33-1336/f.2022.08.002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Division

CHEN Jinran¹, WANG Jiarong², YANG Xueping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o give full play to ultra-large-scale market advantage and deepen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division are significant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reinforce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on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division and the complementary role played by the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The paper finds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division.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scale expans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2) Threshold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only when the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can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division. (3) Further heterogeneity tests suggest that in non-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

收稿日期: 2022-05-06

基金项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国内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XRZ2022039)

作者简介: 陈锦然, 女, 讲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价值链与国内市场、国内贸易流通研究; 王家荣, 女,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商贸流通理论、价值链研究; 杨雪萍(通讯作者), 女, 讲师, 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研究。

gions,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and gradually remove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Value Chain.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National Value Chain; market integration; unified marke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一、引言

综合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大循环动能减弱的外部现实挑战,以及强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不断释放,工业生产能力日益增强的内部客观优势,面向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充分发挥和利用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在着力提升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培育高水平开放竞争合作新动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促共进。事实上,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就是要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提升本国企业的主导作用,增强国内分工体系的竞争力,推进国家价值链构建。^①依托国家价值链构建促进国内地区间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的分工合作与贸易往来,不仅将有助于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合作机制,还将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夯实庞大的国内市场基础。因此,国家价值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驱动机制,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下具有突出意义。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国发展模式,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和区域间比较优势突出的典型特征为通过分工深化实现效率提升和优势互补提供了有益的先验条件,但要立足国内市场实现分工贸易网络的高效建立与循环畅通,流通业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流通作为畅通经济循环、连通生产和消费的核心环节,流通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完善国内市场运行机制、改善国内市场环境、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业已被纳入我国“十四五”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领域改革卓有成效,内贸流通体系实现了快速发展,全国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建立,为推进商品、要素、资源全面自由流通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现阶段而言,中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流通业发展进程中也存在例如流通效率偏低、流通费用偏高、流通组织化程度过低和渠道结构松散等诸多“堵点”亟待疏通。^②

由此,在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有必要深入认识流通业发展与国家价值链分工之间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所强调的,“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本文首先结合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现实要求,使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投入产出分析与增加值核算方法对2007年、2010年、2012年和2015年分省份一行业层面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针对流通业发展水平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③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流通业发展对国家价值链的影响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

^①本文的国家价值链概念与既有研究中的国内价值链相似,均反映以本国企业为主导、立足国内市场所形成的分工体系(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黎峰,2016)^[1-2]。但区别于部分文献将最终需求来源与投入要素来源限定在国内市场以测度国内价值链(沈剑飞,2018;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3-4],结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与分工专业化演进的客观规律,本文在国家价值链的测度中还考虑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作用。

^②部分文献对流通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堵点”展开了细致讨论,例如王晓东和张昊(2012)^[5]指出由于批发组织职能弱化所导致的“分枝状”流通渠道结构,可能阻碍地区间的沟通和联系;谢莉娟和王晓东(2014)^[6]则详细阐释了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居高的影响因素,并着重强调要将优化商流作为降低流通费用的重要途径。

^③对照“两头在外”加工贸易模式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本文将主要环节由本国企业承担,但在生产过程中涉及原材料及中间品进口或运用国际市场的价值链分工模式,以及所有环节均布局于本国市场的价值链分工模式均定义为国家价值链。并且与既有价值链研究中所采用的测度指标与方法相类似(黎峰,2016;盛斌等,2020)^[2,7],本文使用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来反映国家价值链分工水平。

并进一步聚焦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互补性作用。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是,一方面,既有文献已从流通主导的供应链战略联盟与渠道控制、流通企业外向国际化、流通产业发展与影响力提升等角度,对制造业结构调整与价值链创新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展开了丰富的定性研究(丁宁,2014;丁宁,2015;祝合良和石娜娜,2017)^[8-10],但相关经验证据有待补充。本文提供了流通业发展影响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理论与经验证据,由此可能发掘联动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新路径,并有助于启发构建新发展格局进程中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本文结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要求,引入了以国内市场一体化协同流通业发挥助益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正向影响的互补性作用探讨,从而为全国统一的市場制度规则建立,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贡献有益经验。

二、理论基础与机理分析

下文首先基于已有文献研究进展,阐释流通推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内在理论基础,进而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求,对流通业发展与国家价值链分工的关系展开影响机理分析,并考虑国内市场一体化所发挥的互补性作用。

(一) 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彼此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而流通是从总体上看上的交换,属于交换领域的范畴,因此将流通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动态联系、辩证统一的框架中开展具体分析是固有规律(纪宝成等,2017)^[11]。既有文献围绕流通创新发展推动需求侧消费扩容升级(杨水根等,2020)^[12]、促进供给侧产业结构转型(汪旭晖和陈佳琪,2021)^[13]、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谢莉娟等,2021)^[14]等视角展开研究,从不同维度支持并强调了流通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所发挥的关键枢纽作用。

聚焦本文的研究关注,国家价值链以模块化生产和区位分散化为主要特征,从而伴随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生产者分离是常态。而流通所发挥的“同类项”合并重组功能将有助于实现生产者结合,商品要素资源等生产资料在生产主体和地理区域间流转的过程中,也有赖于流通的“保驾护航”(纪宝成等,2017)^[11]。具体而言,生产链条迂回程度的加深对链条上下游的信息传导与沟通效率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具有交易性质的流通环节兼具终端消费信息获取和引导上游投资生产的双重职能,无疑处于产业价值创造与信息传递的核心枢纽地位(宋则等,2010)^[15]。因此,流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如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更为突出。

(二) 机理分析

1. 流通业发展对国家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交换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伴随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原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业“末端”定位被逐步打破,并被进一步升位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谢莉娟和王晓东,2021)^[16]。①近年来,流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流通业不仅局限于扮演媒介供需、促进要素流动的桥梁和纽带角色(谢莉娟和庄逸群,2019)^[17],还通过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多业融合发展日益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汪旭晖和陈佳琪,2021)^[13]。当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下,越发强调现代流通体系在畅通经济良性循环中的重要战略支撑作用。以促进流通降本提效、供需协同转型升级为基点(肖亮和王家玮,2022)^[18],流通业既在资源端发挥促进要素

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于如何摆正商品流通业的地位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代表性提法如流通“决定论”“调节论”“一体论”“基础论”“先导论”。虽然对于流通业具体定位的代表性观点存在分化,但流通业从以往的“末端”行业逐步升位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是既有事实。此后,在《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39号)中,首次出现了流通业是“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的表述;《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51号)中也再次强调了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目前这一政策提法被广泛认可与采用。

有序流动、资源合理化配置的作用,还通过跨界融合发展的方式提升媒介效率,向上游制造业生产端延伸渗透的同时也向服务业消费端下沉,推动产业结构联动调整与转型升级,在细化产品生产段落的基础上优化供需匹配效率,强化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从而在推动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进程中发挥基础支撑和先导引领作用。

具体而言,一方面,流通业发挥着保障国家价值链高效有序运行的基础性功能和作用。流通作为社会分工专业化的时代产物,承担着媒介商品交换的特定职能,从而存在商品生产的地方就一定存在商品交换(黄国雄,2005)^[19]。伴随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地区间中间品生产活动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类以交换为目的的中间品也自然地被赋予了“商品”属性,并成为流通活动的对象(张昊,2019)^[20]。由此,流通业在国内分工体系构建与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更进一步地,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与作用发挥要依托国内市场展开,而市场经济的交换本质就内涵着流通业作为国内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理应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助力国家价值链构建的关键发力点和重要抓手。流通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将直接影响商品要素资源在国内市场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水平,并与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总体运行效率休戚相关(张昊,2021)^[21]。因此,流通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资源在国内市场的顺畅流通,是国家价值链构建及其深化的关键。换言之,要实现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应重视流通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石”定位,进一步在具体实践中发挥流通业在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

另一方面,流通业将发挥贯通供给与需求两侧,引导生产、刺激消费的“先导性作用”,推动国内分工体系的构建优化(刘国光,1999)^[22]。事实上,如果将国民经济循环过程拆分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那么流通在匹配供需两端、“赋能”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功能定位将更为明晰。从生产端的角度出发,现阶段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生产方式出现由“推式”向“拉式”的深度变革,流通业可能不断向上游延伸并嵌套于生产端的一系列价值生产环节,通过在采购分配、库存调剂、订单聚合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帮助上游生产商优化工序流程和生产效率,甚至以流通制造商模式实现供应链的逆向整合(谢莉娟,2015)^[23]。因此,随着市场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流通业的角色已经从单纯的商品交易平台把控者转换为价值链的主导者(祝合良和石娜娜,2017)^[10]。通过充分发挥流通业渠道、品牌等信息资源汇聚的功能,将有助于国家价值链参与主体竞争优势提升,支撑制造业破除“低端锁定”的地位局限并持续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从消费端的角度出发,依托现代流通业在信息汇聚、关系调剂方面的资源优势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有效避免由于供需错配导致的资源浪费和配置低效等问题,推动生产要素在价值链各个区段的合理化分配,促进消费市场的高质量供给。此外,有别于以往不同行业基于专业化分工优势“各司其职”的情形,即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聚焦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职能领域,流通业则扮演将商品从生产端运往消费端的“中介”角色,在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生与广泛应用下,产业融合趋势日益凸显,流通业和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边界越发模糊,以流通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助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重要方式。流通业凭借其紧邻消费端的位置优势,通过将下游消费环节的顾客评价、使用反馈、个性需求等数据精准采集并汇总整合后反馈给上游生产环节,协同引领或指导制造商依据市场潜在需求设计或改进产品,将有效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从而助益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

2. 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互补性作用。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国家价值链应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自然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支撑,保障国内市场的高效联通与规模拓展,推动地区间基于比较优势实现生产分工专业化。^①伴随流通基础设施强化与布局优化,以及流通体系信息化、智能化、集约化所带动的渠道升级,流通业发展有效拓宽了商品要素资源的流动空间和经营范围,缩减了流通成本,提升了流通效率,促进了高标准市场设施联通的实现,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基础。与此同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亟须重视国内市场一体化条件的“软件”制度互补功能,

^①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http://www.gov.cn/zhengce/2022-04/10/content_5684385.htm。

一方面应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建设与执行的统一性、协同性,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扎实推进不同区域内部市场规则的高水平统一;另一方面则应加快清理废除阻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自由贸易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阶段,我国国内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仍然较为突出且成因复杂多元,并已逐渐演变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性障碍,甚至可能“削弱”流通业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正向影响。

具体而言,国内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可能带来多轮重复建设、资源配置扭曲、市场范围缩小等潜在问题和矛盾,使得流通业在不同地区间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参差不齐,难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由此造成流通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不经济现象,进而阻碍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因此,流通业发挥助益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正向作用有赖于统一的市场基础规则制度保障。通过破除妨碍商品要素资源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有益于促进流通业效率提升以及地区间商品要素资源流动的顺畅开展。此外,得益于数字化物流枢纽的迅速发展,商品要素资源跨区域流转的时间大幅缩短,商品交换的空间范围逐步拓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流通“硬件”基础已经初步具备,然而支撑全国统一市场的“软件”制度尚未发展成熟,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行为屡见不鲜,极大地阻碍了流通业发挥助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市场流通基础设施的高标准联通以及现代流通网络的构建与布局优化,同样需要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软件”制度支撑,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制度,规范不当的市场竞争与市场干预行为,充分发挥流通业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以“万国造”为典型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也在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对国家价值链构建产生竞争效应,这也对国内市场在营商环境、制度规则等“软件”维度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时,商品要素资源在区域间流转可能面临高昂的贸易成本,具备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的企业可能选择从国家价值链分工环节中退出,转而投身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间环节,从而“弱化”流通业发挥提升国家价值链规模经济水平和分工深度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应当综合考虑流通业发展与国内市场一体化在统一大市场“硬件”维度和“软件”维度建设中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必须协同发展才能实现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并为国家价值链构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

(一) 模型构建

本文聚焦流通业发展对国家价值链的影响,拟构建如下模型展开实证检验:

$$NVC_{i,s,t} = \alpha_0 + \alpha_1 Distri_{i,s,t} + \eta_n controls_{i,s,t} + D_i + D_s + D_t + \varepsilon_{i,s,t} \quad (1)$$

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为, NVC 代表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 $Distri$ 代表流通业发展水平, $controls$ 代表一系列可能影响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控制变量; D_i 、 D_s 和 D_t 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s,t}$ 表示随机扰动项,下标 i 、 s 和 t 分别代表地区、行业和年份。

(二) 变量测度

1. 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借鉴Wang等(2013)^[24]、盛斌等(2020)^[7]的做法,本文在构建国内区域增加值分解框架的基础上,将在中间品跨境两次及以上的复杂价值链下对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进行测度。^①具体而言,本文采用某一地区一行业以中间品形式国内流出后再次流入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的增加值占该地区一行业总流出的比重,作为该地区一行业的国家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假设一国内部有 N 个地区, G 个行业,以地区 i 行业 s 为例,国家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NVCU_{i,s}$)的计算公式为:

^①本文通过区分不同最终需求来源所引致的增加值流转类型,对国家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与后向参与程度展开测度。

以中间品形式国内流出并经过国内其他地区加工后再次国内流出或出口
(至少跨越两次地区边境或一次地区边境与国境)

$$NVCU_{i,s} = \frac{\text{总流出}}{\left\{ \begin{aligned} &+_1 \sum_{j \neq i}^N [(V^i B^{ii})^T \# (A^{ij} \sum_{k \neq i, k \neq j}^N L^{jk} F^{kk})] +_2 \sum_{j \neq i}^N [(V^i B^{ii})^T \# (A^{ij} L^{ij} \sum_{k \neq i, k \neq j}^N F^{jk})] \\ &+_3 \sum_{j \neq i}^N [(V^i B^{ii})^T \# (A^{ij} \sum_{k \neq i, k \neq j}^N L^{jk} \sum_{u \neq i, u \neq k}^N F^{ku})] +_4 \sum_{j \neq i}^N [(V^i B^{ii})^T \# (A^{ij} L^{ij} E^j)] \\ &+_5 \sum_{j \neq i}^N [(V^i B^{ii})^T \# (A^{ij} \sum_{k \neq i, k \neq j}^N L^{jk} E^k)] \end{aligned} \right\} \cdot Z^{i*}} \quad (2)$$

第 s 行

其中，“./”表示相同维度矩阵对应元素相除的运算符号，“#”表示相同维度矩阵对应元素相乘的运算符号。 A^{ij} 表示 $G \times G$ 维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L^{jk} 表示 $G \times G$ 维的里昂惕夫逆矩阵， B^{ii} 表示 $G \times G$ 维的局部里昂惕夫逆矩阵， F^{jk} 表示 $G \times 1$ 维的最终产品矩阵， V^i 表示 $1 \times G$ 维的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 Z^{i*} 表示地区 i 的总流出，即地区 i 向国内其他地区 and 国外的总流出。

$$Z^{i*} = \sum_{j \neq i}^N (A^{ij} X^j + F^{ij}) + E^i \quad (3)$$

其中， X^i 表示 $G \times 1$ 维的总产出矩阵， E^i 表示 $G \times 1$ 维的出口矩阵。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某一地区一行业国内流出中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的中间投入增加值占该地区一行业总流出的比重，作为该地区一行业的国家价值链后向参与程度。以地区 i 行业 s 为例，国家价值链后向参与程度($NVCD_{i,s}$)的计算公式为：

$$NVCD_{i,s} = \frac{\text{国内流出中包含的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增加值}}{\text{总流出}} \cdot Z^{i*} \quad (4)$$

(至少跨越两次地区边境或出一次地区边境与国境)

第 s 行

其中, M^i 表示 $1 \times G$ 维的纯进口系数矩阵。第1、2、3项表示地区 i 以中间品形式国内流出后被国内其他地区吸收的本地区增加值,第4、5项表示地区 i 以中间品形式国内流出后被国外吸收的本地区增加值,第6、7项均表示地区 i 以最终品形式国内流出中所包含的国内其他地区的增加值,第8、9项均表示地区 i 以中间品形式国内流出中所包含的国内其他地区的增加值。第10、11、12、13、14、15、16、17项均表示由地区 i 直接进口并由地区 i 国内流出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第18、19、20、21项均表示由国内其他地区直接进口并由地区 i 国内流出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①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定义地区 i 行业 s 的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NVC_{i,s}$)为对应国家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与后向参与程度的加总。

2. 流通业发展水平。本文借鉴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联合编著的《中国城市流通竞争力报告》,基于流通业规模、流通业结构、流通业效率、流通业设施四个维度对流通业发展水平($Distri$)进行测度。^②

第一,流通业规模。流通业规模旨在立足流通业投入和产出规模的角度,选取客观上存在联系的、能够反映流通业发展现状的若干指标,以比较各地区流通业资源、价值和效益创造的水平,是反映流通业发展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围绕流通业规模,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包括: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流通业年末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以上商品市场成交额。

第二,流通业结构。不论是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直接贡献,还是发挥劳动力就业吸纳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间接作用,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都具有着重要影响。流通业结构即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测度、评价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与相对贡献。具体而言,围绕流通业结构,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包括: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流通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流通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③

第三,流通业效率。除了聚焦流通业自身的发展规模,及其在总体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流通业能否发挥促进国民经济循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的关键在于流通业的效率水平。因此,围绕流通业效率,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包括:批发和零售业成本利润率、批发和零售业库存率、批发和零售业周转率。^④

第四,流通业设施。流通作为畅通经济循环、连通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应“强化流通体系支撑作用”,而物流基建、交通枢纽、商品交易市场等流通业相关基础设施是流通业作用得以发挥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围绕流通业设施,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包括:流通法人企业数、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平均铁路货运距离、路网密度、公路质量。

^①本文的分解思路与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4]相近。具体而言,本文式(2)和式(4)中的分解项与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4]之间的对应关系依次为,第1、2、3项对应第3、4、5项;第4、5项对应第11、13项;第6、7项对应第14、17项;第8、9项对应第15、18项;第10、11、12、13、14、15、16、17项对应第20、21、22、23、24、25、26、27项;第18、19、20、21项对应第33、34、36、37项。

^②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中流通业所涉及的部门包括:第一,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第二,专门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③需要说明的是,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比兼具流通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既能反映流通业的专业化水平(Dekle, 2002)^[25],又关系着流通业的就业吸纳作用(王晓东和谢莉娟, 2010)^[26]。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比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为流通业发展水平日益提升、逐步迈入现代化的表现之一。而流通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则能反映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总体作用。流通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流通业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选取流通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指标的缘由类似。

^④由于流通效率所蕴含的内涵深刻,在指标选择上难以穷尽流通效率的全部内容,本文旨在基于现有研究进展对流通效率的主要维度进行刻画。已有文献中对于流通效率测度指标的选取大多聚焦流通速度和流通成本等维度(李骏阳和余鹏, 2009)^[27]。具体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资本循环次数增多,从而有助于商品周转率提升与商品库存率降低,同时商品在流通过程对资本、劳动力等成本投入要素的占用越少,在单位投入设定下获得的产出越高,则可认为流通效率水平越高(谢莉娟等, 2021)^[28]。

表1展示了流通业发展水平指标的评价维度以及对应细分二级指标的度量方法。^①

表1 流通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指标测度方法 |
|-------------------------|------------------------|----------------------|
| 流通业规模 ($Distri_1$)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总数 |
| | 人均流通业年末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流通业年末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常住人口总数 |
| | 亿元以上商品市场成交额 | 亿元以上商品市场成交额 |
| 流通业结构 ($Distri_2$) | 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 | 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
| | 流通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流通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 |
| | 流通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流通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
| 流通业效率 ($Distri_3$) | 批发和零售业成本利润率 | 批发零售业利润总额/流通成本费用支出 |
| | 批发和零售业库存率 | 批发零售业库存总额/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 |
| | 批发和零售业周转率 | 批发零售业营业收入/存货平均余额 |
| 流通业设施 ($Distri_4$) | 流通法人企业数 | 流通法人企业数 |
| | 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 | 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 |
| | 平均铁路货运距离 | 货物周转量/货运量 |
| | 路网密度 | 公路里程/面积 |
| | 公路质量 | 等级公路/公路里程 |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熵值法进行赋权计算,以得到对应年份分省份流通业发展水平。

3. 控制变量。本文进一步选取了可能影响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控制变量。包括:市场化程度(*Market*),使用樊纲等(2011)^[29]、王小鲁等(2019)^[30]编制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对外开放(*Open*),使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示;互联网水平(*Internet*),使用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比表示;比较优势(*Advantage*),使用第二产业产值区位熵表示;城市化(*Urban*),使用滞后一期人口出生率表示。

4.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包括:第一,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以及2016年版本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主要用于测度中国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第二,流通业发展水平测度,以及一系列相关控制变量测算所需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价格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各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行业个数与分类标准有所区别,因此,本文在进行指标测度前对行业进行了归并调整,调整后得到了16个细分的制造业行业进行实证分析。^②具体包括,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表2展示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描述性统计

| 变量 | 含义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i>NVC</i> | 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 | 0.4309 | 0.1425 | 0.0000 | 0.9789 |
| <i>Distri</i> | 流通业发展水平 | 0.2623 | 0.1283 | 0.1007 | 0.6145 |
| <i>Market</i> | 市场化程度 | 6.4131 | 1.8543 | 2.5300 | 10.9200 |
| <i>Open</i> | 对外开放 | 0.3096 | 0.3513 | 0.0158 | 1.6668 |
| <i>Internet</i> | 互联网水平 | 0.4007 | 0.1558 | 0.1178 | 0.7586 |
| <i>Advantage</i> | 比较优势 | 1.1755 | 0.5897 | 0.0520 | 2.8209 |
| <i>Urban</i> | 城市化(%) | 11.2196 | 2.5876 | 5.7100 | 16.4400 |

^①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重测算的原始数据来源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余二级指标测算的原始数据来源均为《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篇幅,二级指标对应描述性统计备案(见附录备案)。

^②篇幅所限,具体的行业分类匹配对照说明(附录备案)。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流通业发展水平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平均影响效果,回归中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表3第(1)列仅包含流通业发展水平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第(2)列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现出了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显著积极作用。这一回归结果提示,未来应进一步推进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流通业整体发展水平,以协同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尤其是在新发展格局下,流通业促进分工深化、打造供需动态平衡、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引领作用将更为凸显(汪旭晖和赵博,2021)^[31]。

在控制变量中,比较优势、城市化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第二产业集聚水平与城市化率的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助益地区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加深。互联网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部分企业具有借助数字要素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强化其“分区而治”销售策略的动机,而互联网普及率的上升促进了数字要素条件的变化,可能使得这一部分企业能够更为便捷地基于互联网技术实施“反市场整合”策略,从而“弱化”了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正向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的估计系数则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以及年份、地区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流通业发展水平提升表现出了促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积极影响。为进一步验证这一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表4报告了具体的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的结果。

1. 控制多维固定效应与时间趋势。在基准回归控制一系列可能影响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地区、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在表4第(1)(2)列中依次控制了年份—地区的交互固定效应和年份—行业的交互固定效应,以及地区和行业层面的时间趋势项,以减轻潜在的由于遗漏变量所引致的内生性问题下的估计偏误。回归结果显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回归结果十分稳健。

2. 替换变量测度方法。本文替换使用某一地区—行业以中间品形式国内流出后再次流入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的增加值,以及国内流出中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的中间投入增加值之和占该地区—行业总产出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表4第(3)列展示了替换变量测度方法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流通业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可信。

3. 消除异常值影响。为了消除异常值的潜在影响,结合数据特征,本文进一步对核心解释变量流通业发展水平分别进行了1%和2.5%的缩尾处理。根据表4第(4)(5)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了流通业发展水平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影响后,回归结果依然支持了流通业发展对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存在积极作用。

表3 流通业发展水平对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

| | (1) | (2) |
|-----------------------|------------------------|------------------------|
| <i>Distri</i> | 0.2778 *** (0.1071) | 0.3861 *** (0.1060) |
| <i>Market</i> | | -0.0102 (0.0073) |
| <i>Open</i> | | -0.0860 (0.0536) |
| <i>Internet</i> | | -0.0600 * (0.0315) |
| <i>Advantage</i> | | 0.0999 *** (0.0248) |
| <i>Urban</i> | | 0.0153 *** (0.0048) |
| 常数项 | 0.3473 *** (0.0278) | 0.2317 ** (0.1128)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地区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行业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i>N</i> | 1920 | 1920 |
| <i>R</i> ² | 0.107 | 0.128 |

注:1. *表示 $p < 10\%$, **表示 $p < 5\%$, ***表示 $p < 1\%$; 2. 括号内是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表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修正

| | (1) | (2) | (3) | (4) | (5) |
|-----------------------|--------------------------|------------------------|------------------------|------------------------|------------------------|
| | 控制交互固定效应与时间趋势 | | 变量替换 | 消除异常值 | |
| <i>Distri</i> | 0.3585 *** (0.1082) | 0.3550 *** (0.1090) | 0.2928 *** (0.1043) | | |
| <i>wDistri</i> | | | | 0.3472 *** (0.1072) | 0.3651 *** (0.1071) |
| 常数项 | -12.8838 *** (4.8395) | -3.3801 (3.3500) | 0.2790 ** (0.1157) | 0.2463 ** (0.1124) | 0.2460 ** (0.1126) |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 | 是 | 是 | 是 | 是 |
| 地区固定效应 | - | 是 | 是 | 是 | 是 |
| 行业固定效应 | -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地区固定效应 | 是 | 否 | 否 | 否 | 否 |
|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 是 | 否 | 否 | 否 | 否 |
| 地区层面时间趋势 | 否 | 是 | 否 | 否 | 否 |
| 行业层面时间趋势 | 否 | 是 | 否 | 否 | 否 |
| <i>N</i> | 1920 | 1920 | 1920 | 1920 | 1920 |
| <i>R</i> ² | 0.136 | 0.129 | 0.056 | 0.126 | 0.127 |

注:1.第(3)列替换使用以总产出为分母计算的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2.第(4)(5)列的核心解释变量流通业发展水平分别进行了1%及2.5%的缩尾处理

(三) 进一步检验

进一步地,本文在细分不同维度的流通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检验其对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表5的第(1)至(4)列依次展示了流通业规模($Distri_1$)、流通业结构($Distri_2$)、流通业效率($Distri_3$)、流通业设施($Distri_4$)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影响的实证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流通业规模、流通业结构、流通业设施的估计系数符号均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流通业规模、流通业结构、流通业设施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均存在积极影响,即伴随着流通业规模提升、结构优化和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将有利于推进国内区际间的分工合作与贸易往来,助益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①同时,应注意加强整合与完善国内供应链及分销网络,建立健全保障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为流通业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释放流通业助力国内分工体系构建与完善的正向影响效应。

表5 细分维度的流通业发展水平对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

| | (1) | (2) | (3) | (4) |
|-----------------------|------------------------|------------------------|------------------------|------------------------|
| $Distri_1$ | 0.8380 *** (0.2713) | | | |
| $Distri_2$ | | 1.1288 *** (0.3773) | | |
| $Distri_3$ | | | -0.0680 (0.1927) | |
| $Distri_4$ | | | | 0.6208 *** (0.2047) |
| 常数项 | 0.3515 *** (0.1133) | 0.2578 ** (0.1124) | 0.3148 *** (0.1128) | 0.1942 * (0.1138) |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 地区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 行业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 <i>N</i> | 1920 | 1920 | 1920 | 1920 |
| <i>R</i> ² | 0.126 | 0.127 | 0.120 | 0.126 |

^①与郝晓等(2021)^[32]的研究结论类似,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了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重要保障这一观点。

(四) 异质性检验

前文提示,流通业发展水平提升对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在要素资源的投入与使用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可能使得流通业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内表现出对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异质性影响。此外,考虑流通业发展水平在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中西部地区的流通业发展水平提升可能具备促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深厚潜力。^①因此,进一步区分行业和地区类型展开异质性检验,考察流通业发展水平提升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

1. 分行业类型。为考察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间是否存在流通业发展对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异质性影响,首先借鉴相关研究结论,将本研究涉及的行业归类为劳动密集型与非劳动密集型,其中非劳动密集型包括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并进行分组回归(关爱萍等,2016)^[33]。表6第(1)(2)列分别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回归结果。通过比较第(1)和(2)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在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流通业发展均表现出了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流通业发展在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推动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提升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系数差异通过了邹检验)。

2. 分地区类型。进一步区分不同地区类型,检验流通业发展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是否存在不同。^②表6第(3)(4)列分别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第(3)和(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西部地区,流通业发展均将发挥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流通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在中西部地区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系数差异通过了邹检验)。

表6 异质性检验

| | (1) | (2) | (3) | (4) |
|-----------------------|---------------------|-----------------------|-----------------------|----------------------|
| | 分行业类型 | | 分地区类型 | |
| | 劳动密集型 | 非劳动密集型 | 东部地区 | 中西部地区 |
| <i>Distri</i> | 0.3340* (0.1786) | 0.4035*** (0.1286) | 0.3186** (0.1516) | 0.4190** (0.1819) |
| 常数项 | -0.0038 (0.1908) | 0.3101** (0.1345) | 1.1060*** (0.2514) | -0.2332 (0.2053) |
| 控制变量 | 是 | 是 | 是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 地区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 行业固定效应 | 是 | 是 | 是 | 是 |
| <i>Chow Test</i> | 6.69*** | | 4.87*** | |
| <i>N</i> | 480 | 1440 | 704 | 1216 |
| <i>R</i> ² | 0.109 | 0.138 | 0.175 | 0.130 |

五、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互补性作用

前文研究发现,流通业发展水平提升将有益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事实上,伴随着分工深入至价值链层面,中间品跨区域的贸易流动活动将日益频繁。因此要助益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不仅要重视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使其有序衔接,降低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也要注意推进建设商品、要素、资源全面自由流通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制约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堵

^①篇幅所限,中国地区间流通业发展水平差距的典型事实分析(附录备索)。

^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点”,为流通业发挥助益国家价值链分工的积极作用奠定高效坚实的市场运行基础。当前,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构筑国家价值链提供了“天然”的比较优势,但正如机理分析部分所指出的,中国国内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现象却可能成为“削弱”流通业发挥对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正向影响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本文进一步关注国内市场一体化是否能够发挥对于流通业发展助推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互补性作用。具体而言,本文通过设置如下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展开检验:

$$NVC_{i,s,t} = \beta_0 + \beta_1 Distri_{i,s,t} I\{Integration \leq \eta\} + \beta_2 Distri_{i,s,t} I\{Integration > \eta\} + \beta_n controls_{i,s,t} + D_i + D_s + D_t + \varepsilon_{i,s,t} \quad (5)$$

其中, $I\{\cdot\}$ 表示示性函数, $Distri$ 表示门限效应变量, $Integration$ 表示门限变量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本文选择以市场统一度作为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代理变量,并借鉴既有研究,使用相对价格法计算的市场分割指数的反向指标测度市场统一度(桂琦寒等,2006;陈旭和邱斌,2020)^[34-35]。 η 是门限阈值。其余变量设定含义与式(1)相同。

在进行门限回归之前,首先需要对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进行检验并估计门限阈值。门限阈值检验和估计的具体思路为:第一,通过组内变换消除个体固定效应后,计算最小化残差平方和 $S_i(\eta)$ 下的门限估计值 η ;第二,使用 LR 统计量 $(S_0 - S_1) / \hat{\sigma}_1^2$ 对假设 $H_0: \beta_1 = \beta_2, H_1: \beta_1 \neq \beta_2$ 进行检验。其中, S_0 是无门限模型中的残差平方和, S_1 和 $\hat{\sigma}_1^2$ 分别是单门限模型中的残差平方和与误差项方差估计值。 LR 统计量经验分布通过自举法模拟获得,本文设定自举次数为500次。

表7报告了门限效应存在性的检验结果,以及相应的门限阈值估计。可以看出,单门限的检验结果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双门限的检验结果不显著,这说明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于流通业影响国家价值链分工存在单门限效应。

表7 门限阈值的估计与检验

| H_0 | H_1 | F 值 | 门限值 | 95% 置信区间 | 结论 |
|---------|---------|-----------|----------------|------------------------------------|----------|
| 门限数 = 0 | 门限数 = 1 | 36.23 *** | 0.3155 | [0.3059, 0.3344] | 接受 H_1 |
| 门限数 = 1 | 门限数 = 2 | 11.77 | 0.3155; 0.1573 | [0.0978, 0.3344]; [0.1441, 0.1648] | 拒绝 H_1 |

表8的回归结果报告了在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不同区间内,流通业发展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异质性影响。可以看出,流通业发展在门限变量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不同取值区间内对于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当国内市场一体化处在较低水平时,流通业发展难以发挥对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然而,伴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流通业发展促进国家价值链参与程度提升的显著正向作用开始显现。这一回归结果提示,未来应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而为协同流通业发挥畅通经济循环、连通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作用,推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实现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表8 门限回归结果

| | (1) | (2) |
|---|------------------------|------------------------|
| 当 $Integration \leq 0.3155$ 时, $Distri$ | -0.2537 (0.1478) | -0.1615 (0.1444) |
| 当 $Integration > 0.3155$ 时, $Distri$ | 0.2406 ** (0.1051) | 0.3388 *** (0.1032) |
| 常数项 | 0.3570 *** (0.0273) | 0.2220 ** (0.1126) |
| 控制变量 | 否 | 是 |
| 年份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地区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行业固定效应 | 是 | 是 |
| N | 1920 | 1920 |
| R^2 | 0.123 | 0.144 |
| F | 32.76 *** | 19.26 ***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已然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之势,叠加疫情冲击下的“间歇性停摆”,无疑

加大了全球分工体系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为开展区域间专业化分工提供了独特优势,面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标准市场体系日益完善的现实要求,构筑中国国家价值链是长远之策、迫切之举。未来应进一步提升流通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流通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统筹推进流通领域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在更大范围内联系生产和消费,服务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以流通业发展水平提升促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

本文通过测度和检验流通业发展水平对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回答了不同维度下流通业发展助益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国内市场一体化的互补性作用。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流通业发展水平提升有利于推动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进一步从流通业发展水平的细分维度来看,流通业规模提升、结构优化和基础设施改善均有助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第二,在异质性层面,分行业类型的结果显示,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流通业发展在非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推动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分地区类型的结果显示,在中西部地区流通业发展表现出了对于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更为明显的积极作用。第三,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升将协同流通业发挥促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当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时,流通业发展难以发挥推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积极作用。而伴随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流通业发展促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积极作用开始显现。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出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启示:

第一,未来应继续推动现代流通体系的高质量建设,立足国内市场需求和内生潜力,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拓展强大的国内市场空间,为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奠定市场基础。一方面,要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和现代化流通网络体系建设力度,重视流通企业跨区域流转运输配套设施建设在推进区域间生产分工中的关键作用,着力降低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同时,要积极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流通基础设施规模和质量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加快建设速度和成效提升,更为显著地释放流通促进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深厚潜力,缩小区域间的流通业发展差距,进一步推动地区间商品要素资源的自由贸易与高效流通。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流通媒介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天然位置优势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产品创新研发和需求信息汇聚预测的能力和水平,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先导性作用,从而在向上游延伸和下游渗透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尤其是激发并释放流通业发展对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积极作用,促进其价值增值部分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

第二,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逐步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乱象,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软件”维度建设,协同流通业水平提升,发挥对国家价值链分工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在推进统一市场建设进程中的统筹功能,从规章制度层面明确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定义和边界,竭力打造服务型政府,破除地方政府为实现政绩晋升人为设定的区域壁垒和制度屏障,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导向,促进区域间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和规范不正当干预行为,促进有效市场的高标准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跨区域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标准和执法机制,推进行政部门间资源互通、信息共享,尤其要强化对新业态模式下平台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行为规制,破除行业数据垄断等问题,进一步整合并完善国内统一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引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有序衔接,为国内大市场潜在优势发挥和国家价值链分工深化奠定良好基础。

第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和培育国内市场需求潜力,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为国内分工体系构建优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与开放空间。一方面,应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市场制度规则,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市场营商环境,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以更加迅速、更为便捷的方式实现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自主有序流动,为市场经济主体构建深入的生产协作关系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以本土企业为主构建国内分工体系,培育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绝不等同于“闭门造车”,不能以“内循环”名义搞地区封锁,应当注意提高对内开放水平。同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下,也应当积极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互动关联,深化国内大市场的主体地位,发挥吸引汇聚海内外优质资源要素的“引力场”作用,以此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深度的国家价值链的形成和优化。

参考文献:

- [1] 刘志彪,张少军. 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J]. 学术月刊,2008(5):49-55.
- [2] 黎峰. 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基于改进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J]. 中国工业经济,2016(3):52-67.
- [3] 沈剑飞. 流通活动、市场分割与国内价值链分工深度[J]. 财贸经济,2018(9):89-104,121.
- [4] 邵朝对,苏丹妮. 国内价值链与技术差距——来自中国省际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19(6):98-116.
- [5] 王晓东,张昊. 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非政府因素探析——流通的渠道、组织与统一市场构建[J]. 财贸经济,2012(11):85-92.
- [6] 谢莉娟,王晓东. 中国商品流通费用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马克思流通过费用构成的经验识别[J]. 财贸经济,2014(12):75-86.
- [7] 盛斌,苏丹妮,邵朝对. 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经济增长:替代还是互补[J]. 世界经济,2020(4):3-27.
- [8] 丁宁. 流通商主导的供应链战略联盟与价值链创新[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2):22-28.
- [9] 丁宁. 流通企业“走出去”与我国产品价值链创新[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1):13-18.
- [10] 祝合良,石娜娜. 流通业在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中的作用与提升路径[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3):5-11.
- [11] 纪宝成,谢莉娟,王晓东. 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6):60-70.
- [12] 杨水根,张川,董晓雪. 流通效率提升与消费扩容升级——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消费经济,2020(4):67-76.
- [13] 汪旭晖,陈佳琪. 流通业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与作用机制:一个多案例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1(2):22-33.
- [14] 谢莉娟,万长松,武子歆. 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公有制经济调节效应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1(6):111-127.
- [15] 宋则,常东亮,丁宁. 流通业影响力与制造业结构调整[J]. 中国工业经济,2010(8):5-14.
- [16] 谢莉娟,王晓东. 马克思的流通经济理论及其中国化启示[J]. 经济研究,2021(5):20-39.
- [17] 谢莉娟,庄逸群. 互联网和数字化情境中的零售新机制——马克思流通理论启示与案例分析[J]. 财贸经济,2019(3):84-100.
- [18] 肖亮,王家玮. 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双循环的理论逻辑与内在机理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2(1):5-18.
- [19] 黄国雄. 论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J]. 财贸经济,2005(4):61-65,97.
- [20] 张昊. 国内商品贸易与居民消费水平——最终消费品及中间品流通的支撑作用[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9(6):5-14.
- [21] 张昊. 现代流通企业促成产销供应链协同——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的微观基础[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1(6):17-27.
- [22] 刘国光. 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J]. 商业经济文荟,1999(2):9-10.
- [23] 谢莉娟. 互联网时代的流通组织重构——供应链逆向整合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15(4):44-56.
- [24] WANG Z, WEI S J, ZHU K F.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3.
- [25] DEKLE R.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prefectur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2,84(2):310-315.
- [26] 王晓东,谢莉娟. 论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基于中部地区流通业对就业吸纳的贡献分析[J]. 财贸经济,2010(2):98-103.
- [27] 李骏阳,余鹏. 对我国流通效率的实证分析[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11):14-20.
- [28] 谢莉娟,万长松,王诗籽. 国有资本与流通效率: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中国经验[J]. 世界经济,2021(4):3-29.
- [29]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417-418.
- [30]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16-217.
- [31] 汪旭晖,赵博. 新发展格局下流通业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内在机制与政策思路[J]. 经济学家,2021(10):81-89.
- [32] 郝晓,王林彬,孙慧,等. 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J]. 国际经贸探索,2021(4):19-33.
- [33] 关爱萍,冯星仑,张强. 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变动趋势——来自中国2000—2014年的经验证据[J]. 华东经济管理,2016(10):95-100.
- [34] 桂琦寒,陈敏,陆铭,等. 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J]. 世界经济,2006(2):20-30.
- [35] 陈旭,邱斌. 多中心结构、市场整合与经济效率[J]. 经济动态,2020(8):70-87.

